

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以阿富汗为例^{*}

钮松^{**}

[内容提要] 欧盟作为新的国际行为体，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民主治理。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体现出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两种角色：规范的角色和民事的角色，而其民主治理的动力、动机和方式无不根植于此并充满逻辑联系。阿富汗作为新的国际秩序下的破碎国家，其政治重建和民主化发展意义尤为重大，欧盟以异于美国的战略将其纳入中东民主治理之下来促进。欧盟与阿富汗的互动促进了欧盟规范在阿富汗的内化及该国民主化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欧盟的初衷。

[关键词] 欧盟；阿富汗；民主治理；国际角色；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 D856.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508(2009)02-0017-08

一、欧盟的国际角色与民主治理

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的最终结束为1648年以来国际社会长期奉行的“国际平衡”打开了缺口，虽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新格局为“国际平衡”向“全球治理”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全球治理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念有着根本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行为体的构成和行为方式。全球治理的行为体从传统的国家延伸至“世界政治经济机构”、“半正式政府间集会”、“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集合”、“私立协会”、“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宗教组织”等；其行为方式在于“各种行为体更多地协同处理尤其在大量案例上微观处理不断增多的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事务”。²¹ 世纪前后的欧盟在新的历史契机之下参与全球治理，形成了非国家形态的唯一一极。关于欧盟的角色定位存在许多纷繁复杂的定义，主要包括规范性强权(Normative Power)和民事强权(Civil Power, Civilian Power or Civilizing Power)，两者建立在不同逻辑基础之上，前者体现了欧盟的价值与

原则，后者体现了欧盟的行为方式。

欧盟50余年来发展历程首先便是遵循规范和传播规范的过程，将规范在欧洲普及化并进一步期待在全球实现普世化。因为“欧洲的建设方式和它看待世界的方式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位似(homothetic)关系。这是一个显著且基本的起点。”“规范性强权不仅是制定规范的力量。它还是一个试图将它的标准转化成适宜那些接受它们的国家(规范接受者)的国际规制”。欧盟的规范性强权角色现实来源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欧盟力图重塑国际关系的特性，从价值与原则的视野看待世界，并将这些价值和原则作为规范的组成部分，这体现了其价值共同体的属性；其次，欧盟缺乏超强的军事实力进而缺乏强制性的硬力量，规范作为一种软力量在欧盟参与或建立的多边或双边机制里能够发挥巨大的吸引作用。欧盟从法德两国的煤钢联营发展至20余成员国的区域性组织显示了规范的力量，欧盟与对象国分别作为规范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容易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与欧盟规范性强权相契合的便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治模式或曰政治强权，这

* 本文属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1世纪初中东因素对大国关系的影响”(2007B6100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受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资助。

**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Rorden Wilkinson, "Global Governance: A Preliminary Interrogation", in Rorden Wilkinson, Steve Hughes, eds., *Global Governance: Critical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002, p. 2.

Zaki Laidi, "European Preferences and Their Reception", in Zaki Laidi eds., *EU Foreign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Normative Power and Social Preferences*, Routledge, 2008, p. 4.

种模式的主要代表国家是瑞典，它代表了欧盟的“国际政治责任”，它建立在“福利模式和对联合国体系的传统影响之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十分杰出地积极参与在欧盟理事会、联合国及其会议与公约、帕尔梅和布伦特兰委员会以及最近有关全球治理的委员会以推行普遍性和超国家的规范”。

欧盟的发展历程其次还表明其非暴力和经济合作的基础和起点，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经济化的政治，这些便构成欧盟的民事强权。民事强权与军事强权相区别，“欧洲作为‘民事强权’的首要定义建立在从理论上证明将贸易政策视为第一重要的对外政策因素具备合理性的托克维尔式的观念上”。虽然欧盟近年也加强了自身军事力量的建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作为“贸易国家”的转型。欧盟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便开始了其多边主义和新地区主义的实践，冷战后更是加大了力度，在进一步加大对中东欧国家吸收入盟的同时，还加强了与非加太国家尤其是邻邦国家的双边和多边经济联系。理查德·罗斯克莱斯于1986年提出“贸易国家的兴起”概念，探讨了“商业”与“征服”的关系。保罗·肯尼迪则在一年后提出了“大国的兴衰”，探讨了“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的关系，一定程度肯定了经济的重要作用。但罗斯克莱斯显然比肯尼迪更胜一筹，他并非将经济与军事视为平面的互为相关的要素，而是将两者视为不同的观察国际关系的逻辑起点，从而由此衍生出“贸易国家”与“军事政治国家”的不同视野。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在1990年的一篇《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中便指出：“罗斯克莱斯先生是对保罗·肯尼迪的畅销书《大国的兴衰》的一个好的矫正。正如他所指出的，国家通常从看似致命的衰落中复苏，尤其大战中的胜利者有时做得

很好，假如它们有能力应对从驻防经济（garrison economies）到商业经济的及时转变的话。”罗斯克莱斯在当时主要关注了美国和日本的发展而几乎忽略了欧盟的前身欧共体。进入21世纪，欧盟的“贸易国家”角色越来越明显，著名经济学家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等人则在一篇报告中回顾了“欧洲的兴起”的1500-1850年的历史经验，认为“欧洲的兴起主要归因于受中世纪晚期机制相互作用和‘大西洋贸易’所提供的经济机遇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欧盟经历了数十年的经济聚合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欧洲堡垒”的特惠贸易区，其开始显露的地区合作的政治兴趣与世界贸易机制的结合便促使其向“新重商主义力量”的转型。与欧盟的民事强权和贸易国家相契合的便是西德和日本所代表的经济力量或经济模式，在今日欧洲主要代表是德国。

欧盟的政治模式（“规范性强权”、“斯堪的纳维亚的欧洲”）和经济力量（“民事强权”、“德国的欧洲”）共同构成了欧盟在21世纪前后国际角色的全部。“民主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它使用卢梭、康德和伍德福·威尔逊的术语”。欧盟身处作为自由主义民主发祥地的欧洲，继承了欧洲早期的民主观念和历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洗礼的现代民主观念，这些欧洲民主观念在欧盟的运行过程中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欧盟的民主治理，在欧盟制度层面，民主是一种切实的决策机制，但其自上而下的政治精英主导型的“伟人创造政治”使得欧盟的行政权过于集中而欧洲议会相对虚化，欧盟决策充满了成员国政府间博弈而非扩大参与性的协商，因而欧盟在此层面存在着“民主赤字”；但在观念层面，欧洲追求的自然权利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权利意识扭转

Mario Telò, *Europe: A Civilian Power? European Union, Global Governance, World Order*, Palgrave, 2006, pp. 222 - 223.

Goran Therborn, "Europe - Super Power or A Scandinavia of the World?", in Mario Telò eds., *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 Regional Acto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 Post-hegemonic Era*, Ashgate, 2001, p. 242.

Mario Telò, *Europe: A Civilian Power? European Union, Global Governance, World Order*, Palgrave, 2006, p. 199.

Robert Kuttner, "Playing to Our Strengths", *New York Times*, May 6, 1990.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James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9378*, December 2002.

Arnaud Blin, Gustavo Marin, "Re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 July 2007, at http://www.world-governance.org/IMG/doc_Rethinking_without_logo.doc.

在了一起，即将人权（主要是自由）与民权（参与政治）总体进行考察，正如理查德·扬斯（Richard Youngs）所言：“总体而言，极少有证据表明民主的不同‘领域’之间即人权与民主议程之间正在作真正的区分”。欧盟的民主治理较好地回避了自身的民主赤字，并在基础上有效整合了欧洲民主和欧盟民主，将观念民主而非制度民主放在了首位，这既符合欧盟自身的发展现状又顺应了民主的逻辑。不仅如此，欧盟还开展了对“欧盟有效的和民主的多层次治理的分析”的大量计划，尤其是2004年7月至2008年6月开展的为期4年的“连接欧洲治理英才网络”（CONNEX）。2008年8月，由著名欧盟研究专家贝娅特·科勒—科赫（Beate Kohler-Koch）和法布里斯·拉哈（Fabrice Larat）主编的该网络系列报告第九卷《欧盟的高效和民主治理》开篇便指出了民主对于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性，“民主的代表性和问责制，均为合法治理的完全基础”。

二、欧盟中东民主治理的动力、动机与方式

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的动力、动机和方式都根植于其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角色的定位，即规范性强权和民事强权的自身定位。动力、动机与方式是一个有机整体，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较好的体现了这三者的逻辑联系。

欧盟作为规范性强权，其全球治理的动力既在欧盟本身又在规范本身，而民主则是欧盟规范的重要部分，因而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部分：欧盟本身作为有机行为体的动力、“规范”的动力和“民主”的动力。第一，欧盟作为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域组织，但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有机生命体的兴衰过程存在着某种的相似性。斯宾塞继达尔文进化论问世后

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社会中的竞争比拟为自然界的弱肉强食，他探究了自然竞争与社会竞争的关系；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和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重新揭露哲学家霍布斯与化学家玻意耳在17世纪关于气体力学的辩论，探究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关系；亚历山大·温特则借用量子力学原理来充实建构主义理论，探究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关系。尽管他们探究的具体领域有所不同，但其逻辑起点都是将社会行为体视为自然有机体，而自然有机体充满复制和遗传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欧盟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也有着输出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包括民主）的动力。第二，“规范”的动力。如马莎·芬尼莫尔和凯瑟琳·斯金克所言，规范存在着“生命的周期”，即规范的“兴起”、“普及”和“内化”的发展顺序。欧盟作为规范的倡导者具备合法性，而规范本身的生命周期的过程便是一种动力，它同样需要具备合法性的接受者将其内化。作为欧盟规范性强权重要构成的民主规范更是具备全球推行的普适动力。第三，“民主”的动力。民主既是观念，又是制度，而在观念与制度之间不可或缺的是民主的过程或曰民主化的过程，民主的过程也意味着民主本身的动力。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双刃剑，“一个高度教育的、流动的和参与性的社会里内在的民主动力本身”也是有可能造成如美国那样“民主政府的脆弱性”的。但民主作为一种全球遵循的规范性力量，其在世界包括中东地区的发展相对于其他规范性力量而言更具力量，正因为如此，中东地区一些集权君主国家和权威政治国家面对本区域同质国家的民主进程充满压力，正如“《经济学家》精英单元”（EIU）通过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东拥有基本自由与公正的政治体系的国家和那些承受专制政权负担的国

Richard Young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93.

Beate Kohler-Koch, Fabrice Larat eds, "Efficient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NNEX Report Series Volume 9*, August 2008, p. 1.

Martha Finnemore, Kathryn Sikkink,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eter Katzenstein, Robert Keohane, Stephen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MIT Press, 1999, p. 255.

Robert Hollinger, *The Dark Side of Liberalism: Elitism Vs. Democracy*,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6, p. 50.

家之间正在扩大的‘民主鸿沟’已经显现了出来”。

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动机主要有三个来源：欧盟与民主的关系、民主的效能与收益以及中东伊斯兰民主的历史与发展现状。第一，欧盟作为中东民主治理的施动者从逻辑基础上意味着其对于民主的信奉。欧盟的民主思想根植于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重要源头的欧洲文明和以历经变革的对基督教义的认识为载体的基督教文明，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正是在欧洲开展了人类较早的宗教改革、思想解放运动，出现了最早的共和政体和君主立宪的尝试，从思想观念到政治体制等领域都蕴含着早期的民主观念。欧盟的聚合更重要在于地缘政治背后深层的共同价值观念，欧盟的政体形式的最初原形便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提出的“大设计”。作为推进中东民主治理施动者的欧盟因自身的民主素养而有着传播民主思想的天然动机。第二，民主的效能与收益意味着民主的现实作用和潜在作用。观念的民主本身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尤其是欧盟民主观对于人权的极度重视有利于最大限度保护作为个体的人的基本权利，而制度的民主则既是观念民主的外壳又是一种免于陷入无政府主义的制约，缺少观念民主土壤的社会引入的民主外壳往往沦为专制的遮羞布或者产生“劫持的民主”，欧盟十分注重观念民主在中东可能的更大效能。民主对安全与和平的促进作用自康德起便进行了经验主义的研究，国际社会对于“民主和平论”也充满了争议。欧盟在“李普塞特假说”的“经贸促民主”和罗斯克莱斯的“经贸促和平”之间设置了作为中间步骤的“民主”，从而回避了对“民主和平论”的经验主义争论。欧盟的规范性强权的实践使人们也意识到，“关于‘民主和平’的规范性解释为在理论上说明战争与民主提供了一个好的起点”。中东的地缘政治和发轫于中东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在欧洲的本土化使得欧盟有着维护自身安全的动机。第三，中东伊斯兰教国家的因伊斯兰教义中具备的民主

精神和近代以来的民主实践而有着实现现代民主的基础。作为欧盟民主治理的对象之一的中东的民主基础为中东的民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欧洲与中东之间一直存在着文明的交流和相互借鉴，其中也包括民主思想。从阿拉伯帝国百年翻译运动引入大量欧洲典籍重新传入欧洲，到如今解决欧盟“民主赤字”的政治协商理念与伊斯兰教的“乌玛”中历久弥新的“舒拉”（协商）思想的类比而可能的借鉴，这些促使欧盟有着促进与伊斯兰世界和平相处的动机。

欧盟作为民事强权的角色便意味着其中东民主治理以经贸交流为主的行为方式，主要包括经贸合作和经济援助。欧盟前身欧共体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前关注的重心不在中东，但还是相继与许多地中海沿岸国家签订了联系国协定或者内容各异的双边贸易协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盟开始改善其与中东地区的关系并加大对其关注力度，1972年的巴黎峰会提出了“全球地中海政策”（GMP）的计划，但“最终全球地中海政策被证实令各方失望”，“洛美模式的集体依附被地中海（欧共体）非成员国（MNC）完全否决，且欧共体—地中海非成员国之间的谈判最终仍为双边”。进入90年代，随着中东局势的剧变以及大量北非穆斯林移民欧洲，欧盟于1995年召开巴塞罗那“欧洲—地中海部长级会议”，发表的“巴塞罗那宣言”涵盖了经贸的章节，目标是在2010年建成“欧地自由贸易区”。作为实践巴塞罗那进程所体现的整体政策和自由贸易的“地中海援助计划”（MEDA）自1997年元月开始推行，不仅如此，欧盟还支持了2004年约旦、突尼斯、埃及和摩洛哥签署“阿加迪尔协议”以加强中东区域内自由贸易的发展。2005年，巴塞罗那进程“五年工作计划”出台。法国总统萨科奇则进一步提出了充满争议的“地中海联盟”计划，在经过该计划的调整后，“巴塞罗那进程：地中海联盟”于2008年7月13日的巴黎峰会上正式成立。《地中海巴黎峰会联合声明

Economics Intelligence Unit, "The Dynamics of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EIU Special Report*, March 2005.

Thomas Risse, "Democratic Peace - Warlike Democracies?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beral Argument", in Gustaaf Geeraerts, Patrick Stouthuysen eds, *Democratic Peace for Europe: Myth or Reality?*, Vub Brussel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9.

Charlotte Bretherton, John Vogler,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Global Actor*, Routledge, 1999, p. 154.

草案》称该联盟“将是欧盟与这些国家双边关系的补充”，并提出了多个重点倡议包括“地中海商业发展倡议”。虽然欧盟与地中海之间在一定程度超越双边关系模式，但欧盟与海湾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机制却发展相对滞后，欧盟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开始建立了合作关系。而欧盟与中东地区除了地中海沿岸和海合会国家之外的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等国仍旧是传统的双边联系。从总体看，欧盟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就中东而言，行为者包括具体国家、国家组织；就欧盟而言，行为者包括具体欧盟国家和欧盟本身，其合作关系多层次、立体化。欧盟与中东间当今的经贸模式如同中世纪的欧洲政治一样，其“权威多样且边界重叠”，“权威通过复杂的等级来组织”，因而出现了一种赫德利·布尔所言的“新中世纪主义”的局面。

三、欧盟中东民主治理：阿富汗的实践

欧盟对于阿富汗的重新关注始于2001年“9·11”事件之后，这种关注不仅仅在于制造“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千丝万缕联系，更在于阿富汗的关键性战略地位和对于极端伊斯兰势力扩散的忧虑。阿富汗北部与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接壤，东部和南部与南亚的巴基斯坦接壤，西部与中东的伊朗接壤，甚至在最东部与远东的中国有着92.45公里的陆地边界，15世纪之前便是连接欧洲、中东、印度和远东的贸易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19世纪以来，极具地缘战略价值的阿富汗成为大国垂涎之地，从1838至1919年间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英阿战争，最终阿富汗获得了独立。1979年至198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并扶持傀儡政权，阿富汗各反对派别进行了10年的抗苏战争。2001年10月，美国为首的联军进攻阿富汗，旨在打击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但时至今日塔利班和“基地”组

织仍然存在并有卷土重来之势。传统上阿富汗国家身份归属模糊，虽然第13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接纳其为正式成员，但由于阿富汗与“9·11”恐怖袭击事件密切相关，美国与欧盟更多将其纳入大中东范畴进行考察，阿富汗错综复杂的局势与其连接中东、南亚、中亚乃至中国的战略地位不无关系。

阿富汗虽然与欧洲相去甚远，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极端伊斯兰势力易于假借其作为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传播至世界各地，欧洲本土的极端伊斯兰势力就与藏匿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联系密切，阿布·卡达尔（Abu Qatada）便被誉为本·拉登“驻欧洲精神大使”，他于2008年6月17日在英国获释，英国内政大臣雅克·史密斯（Jacqui Smith）就对“法庭尽管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给予阿布·卡达尔假释感到极度失望”。阿富汗的最终和平稳定不在于武力的征服，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面对穆斯林势力在欧洲的逐步壮大，欧盟在阿富汗的民主治理首先在于维护欧洲安全，其次在于实现阿富汗的稳定与繁荣，并在此基础上弘扬欧盟的民主观念并抵消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带来的压力。由于阿富汗长期的战乱以及塔利班政权时期的封闭致使阿富汗经济凋敝，欧盟主要采取了对其进行经济援助为主的方式促进其民主化发展。

第一，欧盟自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便加大经济援助阿富汗支持其重建进程。欧盟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便由其设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办公室与阿富汗开展了最初的联系，90年代初便开始通过“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ECHO）对阿富汗进行援助。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于阿富汗重建的捐助金额占2002年东京会议和2004年柏林会议所确立的125亿美元的30%，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在2006年的伦敦会议上决心在今后再为阿富汗提供24亿美元（约合

“Draft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Paris Summit for the Mediterranean”, Paris, July 13, 2008.

Andrew Gamble, “Regional Blocs, World Order and the New Medievalism”, in Mario Telò eds., *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 Regional Acto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 Post-hegemonic Era*, Ashgate, 2001, p. 29.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Associated Press, “Bin Laden’s ‘Spiritual Ambassador to Europe’ Free on Bail in Britain”, *Fox News*, June 17, 2008.

20 亿欧元) 的重建援助。欧盟委员会迄今出台了 2 份“阿富汗国家战略文件”(CSP): CSP (2003 - 2006 年) 侧重初始阶段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和提供公共服务, 而 CSP (2007 ~ 2013 年) 则在前一份文件的基础上确立了 6 个关注的领域, 包括 3 个焦点领域和 3 个非焦点领域。3 个焦点领域分别为农村发展、治理和健康, 这与对伦敦会议确立的“阿富汗契约”(Afghanistan Compact) 进行补充的临时“阿富汗国家发展战略”(i-ANDS) 中规定的优先领域相吻合, 3 个非焦点领域分别为社会保护、排雷行动和地区合作。欧盟第二个 CSP 的目标在于促使国家稳定、处理毒品贸易, 使政府有能力提供各种层次的服务, 建立法治和保障人权, 以便在此基础上与阿富汗当局协作实现“新千年发展目标”(MDGs)。

第二, 欧盟开展与阿富汗的贸易关系。欧盟与阿富汗的贸易交往始于塔利班政权垮台之后, 欧盟从阿富汗的贸易进口额从 2002 - 2006 年分别为 1900 万、5300 万、2600 万、2500 万和 3600 万欧元, 所占欧盟总进口额除 2003 年为 0.01% 外, 其余年份均低于此数; 欧盟对阿富汗的贸易出口额从 2002 - 2006 年分别为 1 亿 3300 万、1 亿 8800 万、2 亿 5400 万、3 亿 2300 万和 4 亿 1800 万欧元, 分别占欧盟同年总出口额的 0.01%、0.02%、0.03%、0.03% 和 0.04%。2006 年, 阿富汗是欧盟排名第 156 位的进口伙伴、第 112 位的出口伙伴和第 129 位的贸易伙伴, 而欧盟是阿富汗排名第 2 位的进口伙伴、第 3 位的出口伙伴和第 2 位的贸易伙伴。阿富汗因其脆弱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主要得益于“普遍优惠制”(GSP) 和“除武器外一切商品的倡议”(EBA), 但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 欧盟与阿富汗之间存在的严重贸易不对称性仍十分明显。阿富汗微不足道的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 而塔利班政权时期畸形的毒品经济则流毒至今。北约领导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ISAF) 官员认为“阿富

汗经济由西方援助和非法毒品贸易组成”, 北约驻阿富汗民事代表希克梅特·切廷 (Hikmet Cetin) 估计阿富汗“毒品工业的价值几乎达每年 30 亿美元”, 构成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至 60%”。鉴于毒品贸易在阿富汗经济中的绝对比重, 欧盟于 2007 年元月宣布今后 4 年为阿富汗提供 6 亿欧元 (约合 7 亿 7500 万美元) 的援助旨在“消除腐败”和“发展替换种植”来渐进式使阿富汗经贸步入正轨。不仅如此, 欧盟还积极支持阿富汗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发展。欧盟同美国一道资助建设连接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两国的比尼亚 (Pyanj) 河大桥计划, 此大桥将“聚合中亚与南亚和东亚”的古代丝绸之路, 两国还将在河的两岸建立“自由经济区”, 这必将为今后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在 2006 年 2500 多万美元的基础上提升创造条件。

欧盟的经贸方式促进与欧盟民主观念的结合使得民主规范在阿富汗得到了初步接受, 这为民主的内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在阿富汗得到了一定的实践成效, 虽然阿富汗民主化进程不仅仅只由欧盟推进, 但在此问题上欧盟与阿富汗政府之间存在着良好互动。但也不能过分夸大欧盟的民主治理在阿富汗的实践, 阿富汗分裂的局面依然是当前最大的挑战, 而国家的重新聚合仍需在民主的旗帜下才能实现, 这将进一步考验阿富汗政府和人民的智慧和民主思想的培育。

第一, 阿富汗在战后重建, 尤其是政治重建、民主选举与政治和解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阿富汗战争结束不久, 德国波恩便承办了由联合国直接运作的关于阿富汗战后政权重建的国际会议, 为阿富汗的民主化进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波恩会议协定涉及到许多关于未来政权走向的安排, 如决心“尊重人权”, “承认阿富汗人民依据伊斯兰、民主、多元主义和社会公正的准则自由决定其政治未来的权力”, 以及“确保临时安排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s Relations with Afghanistan”.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Afghanistan/intro/.

European Commission, “EU - Afghanistan Trade Figures”.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afghanistan/docs/01_trade_figures.pdf.

Ahto Lobjakas, “Afghanistan: NATO, EU Won’t Take Direct Role Against Drug Trade”,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Feb. 14, 2006.

“EU Pledges Aid to Afghanistan to Fight Corruption, Drug Trade”, *Deutsche Welle*, Jan. 21, 2007.

Editorials, “Expanding Afghanistan’s Trade”, *VOA News*, Sept. 4, 2007.

的更广泛的代表性”等，并对法律框架、司法体系、权力移交、临时行政当局的建立和组成进行了规划。以卡尔扎伊为主席的临时政府于2001年12月正式成立，2002年6月，阿富汗大国民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卡尔扎伊为总统的过渡政府。经过数年筹备，阿富汗首次总统大选于2004年10月举行，包括一名女性在内的18名候选人角逐总统职位。而欧盟委员会在此之前的2004年8月便派遣了“欧盟民主与选举支持代表团”（EU DESM），该代表团将重点考察总统大选的关键部分，并将支持“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以及该国国内观察组织在大选期间的工作，并将与欧盟驻阿特别代表及欧盟委员会驻喀布尔使团紧密合作。欧盟委员会许诺为该选举提供2400万欧元，而据联合国统计，欧盟及其成员国捐助金额占选举注册国际捐助总额的一半，占组织该项选举资金的40%。卡尔扎伊当选为阿富汗首任民选总统。2005年9月，阿富汗国民大会和省议会选举如期举行，这是该国30年来首次议会选举。而在此之前的2005年7月，欧盟委员会派遣了“欧盟选举观察代表团”（EOM）以观察和评估此次选举，除了该组织自身运作所需的400万欧元以外，欧盟为组织阿富汗议会选举提供了850万欧元，并为议会机制化发展提供了300万欧元。该代表团在《最后报告》中对选举持肯定态度的同时也承认了阿富汗局势仍处在动荡之中。在阿富汗缺乏民主基础的情况下由外力主导的政治重建和民主化进程本身就充满缺陷，欧盟积极参与的阿富汗民主化进程是对美国的阿富汗战略的一种修补。经过数年的民主熏陶，阿富汗政府也开始转变思路，正视塔利班卷土重来的事实，积极谋求与塔利班的和解并期望将其纳入宪政的框架之内，2008年10月，卡尔扎伊政府的代表与前塔利班政府领导在沙特国王

阿卜杜拉的陪同下在麦加进行了会面。卡尔扎伊政府的举措旨在通过自主的决策加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并用民主和解而非单纯武力消除反对派的思路，正如《时代周刊》一篇文章所认为的：“国际社会为扭转塔利班统治所造成的毁灭的失败尝试已经耗费了7年时间和数以亿计的美元；一个更好解决塔利班卷土重来的办法应该是修正过去的错误，并实现仅此一次的国际许诺的民主与发展”。卡尔扎伊政府的和解行动还有更直接的目的，那就是为正在开展的2009年第二次总统大选的选民登记工作和明年的大选最大限度创造和平的环境。

第二，阿富汗妇女境遇得到了相对于塔利班政权时期较大的改善。虽然阿富汗的民主化进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主要局限于政府层面，尤其是中央政府层面，其国家整合仍亟待时日，市民社会的成长也是步履缓慢。性别平等是欧盟民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其他层面，阿富汗妇女权益的改善进展迅速。妇女不仅获得参政的权利，还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较大的活动空间。虽然国际社会对于伊斯兰的妇女观存在不同的理解，但塔利班政权下过于严苛的对女性的限制招致了普遍的批评。阿富汗新政府和民间力量都意识到性别平等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早在2001年12月，来自不同国家的阿富汗妇女领袖联合欧洲妇女游说团和联合国妇女基金会（UNIFEM）在布鲁塞尔召开阿富汗妇女民主峰会，与会者认为：“任何取代塔利班的政府必须有公开的对民主和妇女权利的承诺”。2004年，阿富汗女医学教授贾拉尔竞选总统，虽然未能当选，但其给国际社会展示了阿富汗女性的崭新一面。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阿富汗妇女更加积极参与投票，并在议会下院获得了保留的席位，省级议会会议席妇女的比例也作了相关规定。除了

“Agreement on Provisional Agreements in Afghanistan Pending the Re-establishment of Permanent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http://www.afghangovernment.com/AfghanAgreementBonn.htm>

European Commission, “Further European Union Support fo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Afghanistan”, Brussels, Aug. 17, 2004.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afghanistan/news/ip04_1035.htm

European Commission, “EU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 Now Deployed in Afghanistan”, Brussels, July 26, 2005.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human_rights/eu_election_ass_observ/afghanistan/index.htm

Aryn Baker, “Facing Reality in Afghanistan: Talking with Taliban”, *TIME*, Oct. 13, 2008.

“Afghan Women’s Summit for Democracy, 4 - 6 December, Brussels Fifty Afghan Women Leaders to Attend”.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1/1717&format=HTML&aged=1&language=EN&guiLanguage=en>

参政，阿富汗妇女在社会生活中也展示了新的气息，2005年阿富汗一家私人电视台便开展了名为“阿富汗之星”的平民音乐选秀活动，也采用了手机短信投票的方式，这项活动意义非凡，既将女性参与社会提升到一个高度，又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一种自由表达意愿的民主选择意识。除此之外，阿富汗还派出女性参加国际体育赛事尤其是奥运会，而这在塔利班时期是不可想象的。阿富汗女运动员中最为出名的是参加过雅典和北京两届奥运会的罗比娜·穆齐米亚（Robina Muqimyar），她在2004年参加塔利班倒台后首次的雅典奥运会时称：“在阿富汗的妇女将看见我们，并知道她们可以做任何事情”，英国《每日电讯报》一篇报道充满寓意地称：“罗比娜使阿富汗妇女重归起点”。2005年11月，在《欧盟—阿富汗联合声明》中，双方都确认要“尤其

特别强调促进阿富汗妇女对卫生与教育的参与，她们在阿富汗公共生活中的合适位置，以及需要保护她们免于压迫和暴力”。

尽管近年塔利班有卷土重来之势，但也不容否认阿富汗局势越来越平稳的事实。阿富汗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了民主化进程，这既有助于该国重返并融入国际社会，又有利于在新的思路下解决塔利班的问题，所有这些长远看有助于地区稳定。阿富汗的民主化进展与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盟所付出的努力密不可分，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思想在阿富汗的实践尽管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但其进步性和所取得的成功毋庸置疑。欧盟在此过程中，既保持了自己的主动地位，又给予阿富汗自主的发展空间，将自身的理念较好展现了出来。

（上接第16页）

特色方面的确做得很好。而文化往往在具有独特性时，才会促使不处于该文化内的人对其产生“好奇—好感—共鸣”这一过程。与中国在海外展示“精心准备”的文化产品相比较，印度在推进其文化软实力时所展示的更多就是自身而非历史，这使想要体验异域风情的人们对印度旅游充满向往，当真正身临其境时也不会失望。

（四）文化软实力内涵较为符合时代需求，具有一定的普世性

综观印度的文化软实力，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价值理念、流行文化或是政治价值观中都有不少特质符合时代需求，具有一定的普世性。如前所述，印度文化中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多元化、包容性的政治价值观为解决全球普遍存在的

精神信仰危机、生态环境恶化、民族宗教矛盾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甚至流行文化中的瑜伽之所以风靡世界，主要也因其为快节奏生活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舒缓压力、放松身心的方式。

总之，通过大力推进文化软实力外交，印度不但极大地改善和提升了国家形象，也为自身赢得了更多的利益。如周边环境更为和平、友善；从非洲拉美得到了更多的能源；在欧美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这使印度“自独立以来，第一次与所有大国的关系都在不断地螺旋式上升”。可以说，扩展文化软实力为印度的崛起和复兴营造了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无与伦比地融合在一起的印度，将成为所在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构筑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

Nick Britten, "Robina Puts Afghan Women Back on the Starting Line", *Telegraph*, Aug. 19, 2004.

"EU - Afghanistan Joint Declaration: Committing to a New EU - Afghan Partnership", Nov. 16, 2005, Strasbourg.

Pranab Mukherjee, "India's Foreign Policy", Address at CII National Conference 2008, Apr. 29, 2008 <http://mea.gov.in/>

ABSTRACTS

Sino-Pakistani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Speech by Gen. (R) Pervez Musharraf, Former President of Pakistan

US Readjustment of Anti-terror Strategy towards South Asia: Observations and Predictions

Zhang Li

Although the anti-terror war in Afghanistan initiated by the US has continued for more than seven years, the situation of combating terrorism in South Asia is still challengeable. After taking office as new US President, Obama announced a series of new policy initiatives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The policy measures include highlighting the relevance of Pakistan to Afghanistan on an operational level, emphasizing balance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efforts, and attempting to enhance influence on the India-Pakistan interaction. The initiatives deserve close observing with some visible limitations and uncertainties.

New Trends in India's Diplomacy: To Promote Cultural Soft Power

Ren Fei

India has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soft power to attaining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has tried to promote in foreign relations. India's soft power arises from traditional values, popular culture and political ideas. The traditional values focus on spirit than on material and advocate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popular culture is rich in content and has strong appeal to the world; and the political ideas show the features of being democratic, diversified and inclusive. Today, India is promoting soft power through diplomacy in SAARC, its neighborhood, Africa, Latin America, EU and North America. By expanding soft power, India advances its national image and develops a helpful and goodwill environment.

EU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Greater Middle East: To Take Afghanistan as an Example

Niu Song

As a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actor, the EU has actively joined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practiced the approach i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Two different but connected roles in this process have been seen—normative power and civil power. Being a fragmented country, Afghanistan comes to be a meaningful arena of EU democratic governance as far as Kabul's reconstru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are concerned. The initiatives help internalize EU norms and democratic progress in Afghanistan.

The Emerging Indo-South Afric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Deng Hongying

After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93,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South Africa have developed stably in various domains. In the multilateral scene, both countries have coordinated closely and explored new patterns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Despite several restricting factors,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promises an increasingly bright prospect.

The Gwadar Port: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Zeng Xiangyu

While promisingly speeding up Pakistan's economic growth and serving its domestic stability, the Gwadar Port also creates a big impact on global security, particularly in South Asian and Indian Ocean region. The port,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a regional communication hub, draws great attention fro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The prospects of Gwadar are encouraging but some adverse effects probably caused by geo-strategic contention, inadequat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volatile regional